西南边疆脱贫攻坚的特色实践及 对乡村治理的推动

时雨晴¹

【摘要】：乡村治理是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脱贫攻坚工作被深度整合进乡村常规行政管理体系中，并通过强大的行政统筹、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夯实了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有力推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西南边疆作为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形成了诸多通过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治理的特色实践。

【关键词】：西南边疆 脱贫攻坚 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0）06—0125—07

一、引言

2020 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内化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提出“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体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①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内含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②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最突出的短板在于农村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③，“农村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性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要“确保到二〇二〇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④。

西南边疆是少数民族集聚区，地形地貌复杂、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交通、水利、通讯以及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严重匮乏^⑤，导致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区域性、整体性贫困问题突出，成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脱贫攻坚以来，西南边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和“六个精准”要求，精准施策、尽锐出战，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胜利。云南普洱市 6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61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云南德宏州 4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86 个贫困村（含 53 个深度贫困村）、14.91 万人实现脱贫退出，人口较少民族和直过民族贫困人口实现“整族脱贫”；广西大新县 2016 至 2019 年实现脱贫摘帽 51 个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从 21.18% 降至 2019 年 0.13%；广西凭祥市建档立卡贫困户 3311 户 11792 人和 10 个贫困村，2019 年实现全面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从原来的 12.8% 降至 0%。

实践证明，脱贫攻坚与乡村治理相辅相成。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影响和制约着脱贫攻坚的成效，另一方面，有效的脱贫攻坚实践能够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①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因此研究脱贫攻坚对乡村治理的推动作用，对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

在乡村治理的研究方面，当前学者认为目前中国部分地区乡村治理存在农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能力不足、“村两委”

作者简介：时雨晴，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边疆区域发展与旅游地理研究。

战斗力和凝聚力较低、社会组织缺失、乡村人才匮乏等问题。⁽²⁾陈文胜认为，农民是乡村治理的承载者、受益者和衡量者，而部分乡村在治理过程中偏离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根本要求，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脱离了农民的现实需要和迫切需求、农民在公共决策中严重缺位、公共权力缺位、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化不足等。⁽³⁾周庆智认为乡村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权利缺失所导致的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⁴⁾宋亚平认为在乡村治理中，由于集体土地所有制名存实亡、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坍塌瓦解、村社集体经济力量长期缺失，使得大部分“村两委”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⁵⁾姜晓萍认为在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在规范行为、提供服务、动员农民等方面的作用。⁽⁶⁾柯锦华认为乡村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导致了传统乡村伦理秩序的分崩离析，乡风民德有引领风气、凝聚人心的作用，是乡村治理的灵魂，因此应营造乡村道德文化氛围，重启家风家训和村史修撰，走向乡村善治之道。⁽⁷⁾贾康针对乡村治理中的产业发展问题，提出乡村治理要在“大农业”的概念之下，积极对接互联网，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集群。⁽⁸⁾

在边疆地区脱贫攻坚的研究方面，汪三贵等认为民族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高度耦合，是脱贫攻坚“短板中的短板”，只有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才能持久。⁽⁹⁾凌经球认为虽然近年来广西少数民族聚居脱贫攻坚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部分贫困群众可持续增收困难、部分乡村“控辍保学”难度较大、村级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等问题，因此应通过精准对标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各项指标要求。⁽¹⁰⁾宋媛等针对云南“直过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教育素质、健康素质低下和劳动技能较弱等问题，提出在“直过民族”聚居区脱贫攻坚中完善贫困人口利益表达机制和参与机制、教育扶贫机制、扶贫资源统筹整合机制、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等建议。⁽¹¹⁾柯丽菲等分析了目前中国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交汇期的特点，并指出广西仍面临深度贫困村和极度贫困户未能脱贫、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产业扶贫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等问题，并提出增强农业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加强扶贫车间和农民工创业园建设、推动外出务工人员稳就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建议。⁽¹²⁾覃蓝天认为革命老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应提高民众传承红色基因意识、探索“互联网+”模式，充分发挥独有的红色文化优势。⁽¹⁾

综上，当前学者对西南边疆脱贫攻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脱贫攻坚的区域实践、现实困境、方式举措等方面，而较少关注脱贫攻坚对乡村治理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在梳理总结西南边疆脱贫攻坚实践的特色基础上，探讨了脱贫攻坚对乡村治理的推动作用，以期为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启示和借鉴。

二、西南边疆脱贫攻坚的特色实践

西南边疆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形成了西南边疆脱贫攻坚的特色实践。

（一）云南西盟：脱贫攻坚与基层党建、乡村治理有效融合

西盟县开创性地在村民小组成立“脱贫工作委员会”，走出了一条脱贫攻坚与基层党建、乡村治理有效融合的新路子，开启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评价、自我监督”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主要做法包括：

第一，加强乡村组织建设能力。西盟村民小组从党员、致富带头人、热心村民中推荐选举委员，组建“脱贫工作委员会”，每个委员负责联系10—20户，组织群众落实产业发展、环境卫生整治、调解邻里纠纷、外出务工等工作，让所有农户与脱贫攻坚、乡村治理紧密联系起来。

第二，提升乡村服务管理能力。西盟村民小组着力开展以下工作：每周召开委员会工作会议，每月召开村民大会，精准谋划乡村日常事务管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完善村规民约、组规民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制定村民行为规范、组内环境卫生、组内公益性岗位检查表，由村民小组脱贫工作委员会定期考核打分，实现乡村的有效管理。

第三，充分发挥党员（委员）引领带动能力，把扶贫对象转化为振兴力量，培养产业振兴“新乡贤”。党员（委员）从思想、生活、生产经营等方面对贫困群众进行帮扶，通过讲政策、传经验、带技术、解纠纷，确保每一个有学习意愿的群众都能

得到有针对性的培训。2019年以来，西盟县通过“脱贫工作委员会”组织村民参加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共计356期2.13万人，并组织脱贫示范户讲述自己的“脱贫故事”、观看脱贫新闻，树立群众的脱贫信心。

（二）广西凭祥：立足“边”的优势，实现脱贫致富与稳边固疆的双赢

凭祥立足“边”的优势，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边境贸易蓬勃发展，优先吸纳贫困户参与互市贸易相关工作，依托边贸合作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加大边民分红比例，真正把区位优势变成边民资源，做到了留利于边、留利于民。主要做法包括：

第一，推动边贸扶贫蓬勃发展，提高边民收入水平。凭祥市依托边贸合作社，推动贫困边民参与边贸运输、互市贸易、装卸货物等贸易活动，截至7月31日共有19.8万人参与互市申报，其中贫困边民10.3万，人均每月增收600元以上。疫情期间，凭祥市采取“整进整出”监管模式，使合作社每柜获利300至800元，同时进一步规范合作社管理，加大社员分红比例，申报补助由20元/天提高至50元/天，2020年上半年人均分红达500—800元。此外，边贸带动了旅游业、加工业等行业的发展，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文员、业务员、管理员等工作岗位，每月可获得工资性收入2000—5000元。

第二，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组织建设。利用国家给予边民的优惠政策，凭祥创新推广“党组织+合作社+互助组+贫困户+集体经济”边贸合作社发展模式，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发展特色。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当地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的逆势增长，截至2020年8月31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364.02万元，38个村（社区）全部提前实现集体经济收入超5万元，为崇左市第一。2020年3月，凭祥创新推出“党建引领+跨地联建”合作社模式，把边境14个村（社区）17家边贸合作社整合至边境贸易货物监管中心，建立边民边贸集体经济产业园，统一管理运营，激发边贸扶贫活力，提升整体战斗力，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其中柳班村从最大贫困村蜕变为集体经济强村，成为凭祥第一个集体经济突破50万的乡村，在第二季分红大会，869名社员（包括436名贫困户）每人领到500元的分红。

第三，加强信息技术支撑，推动互市贸易升级发展。疫情期间，凭祥市创新开发边民互市申报APP系统，达到边贸扶贫和疫情防控“两不误”，并为合作社节约了申报成本。与此同时，凭祥市积极推动落地加工试点，首创越南车辆直通厂区模式，大大节约了加工企业成本，并把所节约成本的50%分配给边贸合作社，合作社又将50%分配给合作社边民，剩余50%作为运营资金和村集体收入，保障边民真正享受到互市商品落地加工的政策红利。

（三）云南孟连：创新民族文化传统，推广“宾弄赛嗨”互帮互助机制

“宾弄赛嗨”系云南孟连傣语，特指傣族与周边其他民族基于日常家庭生活需要，自发结成的“没有血缘但像亲戚一样的朋友”，这是孟连各民族团结互助的典范，在民间沿袭至今。脱贫攻坚以来，孟连县充分利用“宾弄赛嗨”族际互助文化传统，有力地推动了脱贫攻坚进程，乡村治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主要做法包括：

第一，生产互帮。孟连县推行“党组织+产业发展”模式，发展壮大茶、咖啡等传统产业，创新发展坚果、牛油果等特色产业，农民群众在生产互帮过程中，通过产业分红、出租土地、参加务工等形式增加收入，实现了各民族共同脱贫致富。

第二，生活互助。在安居工程实施过程中，孟连县群众之间劳力互帮、资金互助，有效整合技术、资金、劳力等资源，共同走向幸福之路。比如部分坝区傣族群众拿出积蓄，支持山区“宾弄赛嗨”户建设安居房；芒冒村建房户通过茶地调换置换宅基地，确保安居工程的顺利完成等。据统计，孟连“宾弄赛嗨”户通过互助筹集了58万乡村安居工程建设资金，7000余人参与互助建房。

第三，经济互通。孟连县依托项目扶持，开展“心连心”“亲串亲”“手把手”等互助活动，引导“宾弄赛嗨”相互传授

先进种植技术、交流农业生产经验、推荐新兴优势产业，拓宽贫困户的“造血”渠道，增强“造血”功能。

第四，文化互融。孟连县充分发挥“宾弄赛嗨”的优良传统，推动族际间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形成互相欣赏借鉴、尊重包容的文化氛围，使民族文化在交往交流中得到升华和传承。

普洱市丰富拓展了孟连县“宾弄赛嗨”互助机制内涵，由民间“人帮人、户帮户、民族帮民族”的互相帮助，升华为“县际互帮、东西互助、城乡互联、干群互系、村组互包”的新型“宾弄赛嗨”脱贫攻坚模式，实现了“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整族脱贫，乡村治理能力不断加强。

（四）云南镇沅：开办“好汉班”，“昔日懒汉”变“今日能人”

镇沅县针对贫困户“素质低”的致贫症结，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创建深度贫困人口培训中心，通过“转变观念+理论知识+实践操作”的教学方式，开展感恩教育、技能培训，使“昔日懒汉”变成“今日能人”，推动“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脱贫”转变，为乡村治理奠定了人才基础。主要做法包括：

第一，政府主导，半军事化管教。镇沅县制定出台《深度贫困人口技能培训转移就业试点方案》，加大县级财政支持力度，整合各部门培训资金，争取中央就业补助、上海对口帮扶资金，建立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的教育培训机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课程涵盖个人卫生教育、体能训练、“自强、励志、感恩”思想教育，以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村电商、家政服务、养殖、建筑工等技能教育，全面教育、引导贫困群众。

第二，精准选择培训对象，搭建就业创业平台。开展贫困人口大调查，针对性地选取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或因缺技术致贫的贫困人口进行轮训；对完成培训的学员开展职业技能鉴定，颁发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为学员搭建创业就业平台并提供两年有效跟踪指导服务，积极引导学员通过以扶持资金、林权、土地等入股方式，与涉农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实现稳定脱贫。

（五）云南澜沧：资源整合，实现“党建领航+科技驱动+产业兴旺”

澜沧县依托自身生态优势，联合中国工程院、云南农业大学等单位，举办院士专家技能扶贫职业教育实训班，手把手培训农民学员学习林下有机三七、冬季马铃薯种植等技能，通过科技扶贫为贫困乡村治理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主要做法包括：

第一，党组织建设与产业发展高效衔接。澜沧县竹塘乡围绕产业布局建设基层组织体系，把党支部建在专业合作社、产业基地、企业、产业协会等产业链上，统领自治组织和产业链发展，培育科技致富带头人，并与5户以上贫困户结对发展产业，教技术管理，以点带面，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进来。

第二，资源整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澜沧县竹塘乡以村为单位进行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统计经济林地等资源，将闲置资源流转整合，大幅度提升资源利用效益；充分发挥以朱有勇院士为首的科技人员的智力和科技优势，带领村民发展林下三七、冬季马铃薯等产业，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与此同时，引进淘宝、拼多多等平台，通过电商打造O2O双线扶贫模式，逐渐形成“党组织引领+农户种植+合作社生产+电商销售”的互动局面，带动当地群众600余户脱贫，每年效益可达300万元以上。

第三，构建产业标准化体系，优化利益联结机制。澜沧县竹塘乡制定《林下中药材一三七生产技术规程》，建立培训、生产、销售和管理标准，聚焦现有特色产业链的延伸与融合，提高产业扶贫组织化程度，村民通过基地务工、土地出租、年底分红等

途径增加收入，实现稳定脱贫，与此同时，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实现产业发展反哺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助推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脱贫攻坚对乡村治理的推动

脱贫攻坚是一项由国家主导的行政任务，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具有显著优势：一方面可以打破以往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行政界限，最大限度地调动和统筹人才、项目、资金、技术等相关资源集聚乡村，并围绕脱贫攻坚进行精准投放；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责任体系和目标实施系统，有效地将政策传递到基层乡村，更好地确保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脱贫攻坚工作被深度整合进乡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等常规行政管理工作中，并与乡村常规行政工作系统有效衔接、相互协同，有力推进了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扭转了乡村基层组织式微和权力弱化、人口空心化、公共资源产权碎片化的趋势。^① 脱贫攻坚对乡村治理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脱贫攻坚夯实了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三个方面。

（一）脱贫攻坚夯实了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

脱贫攻坚以来，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大幅度增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各项惠民政策、工程和项目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涉农资金一定比例用于贫困乡村，并逐渐形成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开发并重的“两轮驱动”乡村扶贫举措。一方面，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支出项，涉及村屯级道路、水电交通、住房改造、易地搬迁、文化广场、村级办公场所以及教育、医疗、养老、饮水安全、环境整治等“短板”领域，并针对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采用兜底保障措施确保其基本生活，解决了群众出行难、用电难、通讯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人民生活生活条件日趋完善；另一方面，通过产业扶贫对种植业、养殖业等产业，以及科技推广和相关培训进行补助，涉及特色农业发展、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的引进、科技培训、干部培训、劳务培训等，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更好的产业和经济基础。

以云南西盟县为例，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38.82亿元，其中发放支农、扶贫再贷款2.95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4.27亿元、扶贫小额贷款1.01亿元，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共计8.21亿元，支持乡村基础设施提升、产业扶贫等项目。通过脱贫攻坚，云南西盟县CD级危房全部消除，群众100%搬进安全稳固的住房；行政村全部实现了户户通电视、通广播、通电话；公路总里程达2443公里，是2014年的1.98倍；乡村义务教育经费得到保障，顺利实行了高中“两免一补”政策；种植业结构由以粮食为主转变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全面发展，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重从2014年21.5%提升到2019年的43.2%，橡胶、甘蔗、茶叶、畜牧、文化旅游五大主导产业的增加值从2014年的2.76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4.38亿元，主导产业扶贫效益初步显现，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大量的资金投入使得西南边疆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发生巨大变化，民生福祉显著提高，产业发展有了起色，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物质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

（二）脱贫攻坚夯实了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

第一，脱贫攻坚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通过“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等制度措施，党员干部深入扶贫一线，直接参与贫困乡村的脱贫攻坚行动，解决实际问题^①，不仅有效拉近了村民与基层干部的距离，提升了基层政府在群众中的公信力，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而且通过整顿贫困乡村涣散的党组织、帮助增强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使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提升，从而巩固了党在乡村的执政基础^②。比如，云南澜沧县竹塘乡脱贫攻坚以来，集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5个，选优配强村组干部90余人，调整优化驻村第一书记4人，培养66名致富带头人成为党员，党组织领导力显著提升。

第二，脱贫攻坚推动了乡村治理的人才队伍建设。脱贫攻坚通过拓展基层干部的成长空间、提高脱贫一线干部的工资待遇、畅通流动和晋升渠道等途径，确保贫困乡村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并针对现实问题加强干部培训，提升其政治素养、理论水平、

业务能力，培养作风硬、会管理、懂政策的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3月6日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基层干部通过开展贫困识别、精准帮扶，本领明显提高，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了解了基层，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在实践锻炼中快速成长”，为进一步推动乡村组织建设提供了人才基础。普洱把脱贫攻坚一线作为培养、检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的大考场，使得388名干部得到提拔重用，居云南前列。

第三，脱贫攻坚推动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模式。脱贫攻坚通过行政统筹机制调动了大量不同单位背景的行政干部参与扶贫，为乡村治理带来了多样的扶贫资源和力量⁽³⁾，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参与的“大扶贫”格局，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由政府的单向管理转变为由社会组织、乡村合作社、企业主体、事业单位等多元主体协同推进，从而形成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⁴⁾。比如，广西龙州县通过加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定点帮扶、省市县等后援单位帮扶、深化粤桂扶贫协作攻坚、引导民营企业结对帮扶等途径，凝聚各方力量，助力脱贫攻坚。

第四，脱贫攻坚提升了组织建设的信息和技术支撑能力。为精准掌握贫困户的实际情况，脱贫攻坚干部对村民尤其是贫困户的基础信息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调查、收集和整理，并引入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农村基础信息数据库和动态监测管理系统，同时培养了一批熟悉智能化、信息化操作和管理的工作人员⁽⁵⁾，为乡村组织建设奠定了信息技术基础。比如，广西宁明县依托大数据建立了劳务信息服务平台，全面收集乡村劳动力信息，实现了乡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同时有效缓解了企业招工难的问题。

（三）脱贫攻坚夯实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

第一，脱贫攻坚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力。政府通过“爱心超市”积分制、电视夜校等方式，扶心扶志扶智，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崇左市龙州县创办包含“政策宣传、技能培训、村民议事”等内容的脱贫励志电视夜校，以屯为单位，组织农民群众学典型、学政策、学文化、学技术，并紧扣村屯基础设施建设、清洁卫生、文明道德和村屯管理等进行民主讨论，集体决策，凝聚群众发展意愿，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宁明县以村为单位组建扶贫“爱心超市”，鼓励群众以劳动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使农民群众实现了从“要我干”到“我要干”的思想转变，创新实施“村决策、乡统筹、县审批”扶贫项目，坚持“做什么由群众说了算，怎么做由群众参与，做得如何由群众评判”，将扶贫项目下放到村一级，把决定权交给群众；普洱墨江县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青联委员等，将“夜校”建到“火塘”边上，利用农闲时间，采取拉家常、讲故事等方式向群众传递党的富民惠民政策，教授自主学习能力和脱贫技能。

第二，脱贫攻坚培养了新时代的职业农民。脱贫攻坚围绕产业发展需要，通过开展贫困家庭劳动力职业培训、青壮年劳动力素质提升行动计划、督促农民群众学习产业和法律知识等途径，教农民群众如何发展产业、如何对接市场、如何管理村庄，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有文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和村民小组致富带头人，确保产业发展后继有人。比如镇远县成立深度贫困人口培训中心、县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学校、乡镇农民技术培训学校、村级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对贫困群众开展素质培训，提高贫困群众的生产技能，破解了“如何种地、谁来种地”的难题；澜沧县联合中国工程院举办柠檬、林下有机三七、冬季马铃薯种植等技能培训班，院士专家手把手培训农民群众，实现科技扶贫。

第三，脱贫攻坚推动了乡风文明的全面提升。通过持续开展“自强、诚信、感恩”主题教育，“好家庭”“好媳妇”“好公婆”评选表彰活动等，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村规民约》，破除陈规陋习，形成健康文明新风尚。比如，云南景东县针对子女有能力履行赡养义务而父母生活起居无人照料等现象，发出《关于敦促赡（扶）养义务人积极履行赡（扶）养义务的公告》，通过司法干预，防止因不履行赡养、抚养义务造成返贫致贫的问题，与此同时，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家风，为进一步推进乡村德治奠定基础。

综上，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通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补齐了支撑乡村治理的物质短板；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人才队伍建设、职业农民培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乡风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参与模式构建等途径，提升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

的主体地位，健全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及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逐渐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

四、小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而乡村治理是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①脱贫攻坚通过强大的行政统筹、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有力夯实了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为接下来的乡村振兴做好了准备。但是西南边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民族宗教多元、经济发展落后、周边地缘关系复杂，使得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中央颁布的部分惠民政策和项目不能在西南边疆得到实施，比如由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县级财政压力大，地方政策配套资金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由于边疆山区自然村屯之间相隔较远，以行政村为单位的脱贫攻坚管理，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和效果；边境山区受到自然环境条件限制，更适于建设小型水利设施，因此无法获得国家对大型水库的建设补助等。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央在政策制定方面应将边疆地区与内陆地区区别对待，制定包容性更强的政策，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性。

注释：

- 1 张琦：《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人民论坛》2020年第2期。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 3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3页。
-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9页。
- 5 马毓彤：《精准扶贫背景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研究》，《农业与技术》2017年第2期。
- 6 左停、刘文婧等：《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 7 郑鹏、赵云龙：《乡村治理现代化：治理主体、内在逻辑与技术路径》，《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4期。
- 8 陈文胜：《农民主体地位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 9 周庆智：《乡村贫困及其治理：农民权利缺失的经验分析》，《学术月刊》2020年第8期。
- 10 宋亚平：《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 11 姜晓萍：《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途径》，《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 12 柯锦华：《转型期的乡风文明：制度变革与伦理重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 13 贾康：《关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八个认识视角》，《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 14 汪三贵、胡骏等：《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志智双扶”问题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
- 15 凌经球：《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县脱贫攻坚问题研究》，《改革与战略》2020年第4期。
- 16 宋媛、张源洁等：《云南“直过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能力提升机制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 17 柯丽菲、邓海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交汇期广西实现全面脱贫的对策》，《沿海企业与科技》2020年第3期。
- 18 覃蓝天：《革命老区脱贫攻坚的实际困境与破解对策——以对广西兴安县的调研为例》，《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 19 王雨磊、苏杨：《中国的脱贫奇迹何以造就？——中国扶贫的精准行政模式及其国家治理体制基础》，《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 20 王晓毅：《脱贫攻坚收官期需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学习时报》2020年8月24日。
- 21 张琦：《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人民论坛》2020年第2期。
- 22 王雨磊、苏杨：《中国的脱贫奇迹何以造就？——中国扶贫的精准行政模式及其国家治理体制基础》，《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 23 左停、刘文婧等：《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 24 刘燕玲、王炳文等：《协同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治理研究》，《发展研究》2020年第5期。
- 25 何继新、王笑语：《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内涵转换、维度指向与质量标准》，《改革与战略》2020年第9期。